

全球非传统安全观察



2023年1月上旬刊
总第54期

中国非传统安全论坛秘书处
圣皮耶国际安全中心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SAINT-PIERRE
圣皮耶国际安全中心

编者语

安全议题在国家利益考虑中的重要性与日俱增。

这一概念早已超越传统和非传统的界限，逐渐纳入了包括社会、经济、环境与制度安全等多方面视角，同时它们也是国际社会各国安全框架的有机组成部分。在这一发展势头推动下，我们呈现了其中反映非传统安全领域关键趋势的重要事件。

联合国政治和建设和平事务部负责人向安理会通报俄乌战争开始距今已经将近一周年，这场战争不仅带来了一场人道主义和人权灾难，给一代儿童留下巨大创伤，并且加速了全球粮食和能源危机。尽管如此，这些重大危害在另一场更为持续的冲突造成的后果面

前仍然相形见绌。

世界银行近期的一份报告指出全球正经历一场严重的粮食危机，超过两亿人面临饥荒和其他紧急情况。新冠肺炎疫情后加重的贫困问题及供应链中断、乌克兰危机以及不断增长的通货膨胀率和物价水平等一系列因素导致粮食和营养不安全的问题更为严峻。

近期调查显示网络攻击、人口贩卖、以及伊拉克和叙利亚地区的大批伊斯兰国人员聚集是当前全球面临的日益复杂多变的安全挑战。纽约大学继续教育学院全球事务中心长期以来致力于理解预测非传统和新安全威胁，并探索开发其应对措施。

环孟加拉湾多领域经济技术合作倡议（BIMSTEC）第十届专注于反恐和跨国犯罪的联合工作组在印度政府主持下于新德里举办了会谈。会谈期间各国代表讨论了环孟加拉湾地区的传统和新出现的非传统安全威胁，与会人员仔细考虑并就如何加强这一区域在反恐和打击跨国犯罪方面的合作等广泛议题建言献策。

我们着重关注并将持续关注理解非传统安全议题演进的多种方式，我们衷心希望能够鼓舞读者继续支持本刊物。如果您感兴趣，请加入我们在 www.spcis.org 的邮件列表，并在 LinkedIn 上关注我们。

2023年1月15日

目录

| | | |
|----|---------------------------------|----|
| 01 | 智库追踪 THINK-TANK TRACKING | 11 |
| 02 | 前沿研究 FRONTIER RESEARCH | 16 |
| | 俄罗斯的社会安全、安全困境和极端的反移民敌意 | 16 |
| | 发现被忽视的：复原力的解放潜力 | 17 |
| 03 | 学者访谈 SCHOLARS INTERVIEW | 18 |
| | Duggan Niall: 中非合作与未来外交关系展望 | 18 |
| | Ahmed Moustafa: 俄罗斯在乌克兰危机中立场的真相 | 20 |
| 04 | 研究员专栏 RESEARCH COLUMN | 24 |
| | 丁思齐 刘国柱: 大国竞争时代的美日科技合作 | 24 |
| 05 | 中亚专栏 CENTRAL ASIA COLUMN | 35 |
| | Diana Toimbek: 世界的粮食安全和可持续发展 | 35 |

学术委员会



余潇枫

主席

非传统安全理论专家
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导
浙江大学非传统安全与和平发展研
究中心主任



魏志江

委员

非传统安全理论专家
中山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博导
《中国非传统安全研究报告》主编
南京大学历史系博士



冯长根

委员

科技安全专家
中国科协原副主席
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
利兹大学物理化学系博士



余翔

委员

知识产权专家
欧洲科学院院士
华中科技大学二级教授、博导
湖北师范大学副校长
管理学博士



徐晓林

委员

非传统安全治理专家
湖南农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特聘教授
原华中科技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公共管理学科评议
组专家



黄建钢

委员

海洋安全专家
浙江省社科二级教授
浙海大浙江舟山群岛新区研究中心
(CZZC) 首席专家
北京大学政治学博士



陈斌

委员

中国非传统安全论坛秘书长
圣皮耶国际安全中心主任
广东印太和平与发展研究院副院长
暨南大学国际关系学博士

顾问团队



Ritu Agarwal
经济安全专家
尼赫鲁大学国际研究院东亚研究中心副教授
德里大学政治科学系博士



Keven E. Bermudez
国际人道主义救援专家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顾问、“好邻居”组织创始人
医学博士



高剑波
信息安全专家
北京师范大学地理学部教授、博导
UCLA 电子信息工程博士



胡靖
粮食安全专家
华南师范大学教授
“三农”与城镇化研究所所长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博士



Mohd. Aminul Karim
区域安全合作专家
孟加拉国独立大学商学院教授
国际政治科学协会会员
印度达卡大学博士



刘国柱
非传统安全理论专家
浙江大学世界史所教授、博导
浙江大学非传统安全研究中心研究员
南开大学历史学博士



Yannis A. Phillis
产业安全专家
克里特科技大学校长
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动态系统控制博士



谌新民
人口安全专家
华南师范大学经管学院教授
广东省人民政府省长决策顾问专家
暨南大学经济学博士



成锡忠
海外利益保护专家
西南政法大学非传统安全研究所特聘教授
北京中安华盾咨询服务有限公司常务顾问
西南民族大学国家民委东南亚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



Chris Hadley
社会安全专家
浙江大学非传统安全管理专业博士



何一平
经济安全专家
广东国际经济协会原执行会长
广东省政协经济委原副主任
广东省广业集团有限公司原董事长



李晓峰
经济安全专家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经贸学院教授
博士与博士后导师
复旦大学博士后



林坚
文化安全专家
人大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
社会系统工程研究中心主任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博士



Filippus Proedrou
能源安全专家
南威尔士大学研究员
色雷斯民主大学能源学博士



Jeffrey Reeves
文化安全专家
加拿大亚太基金会副总裁
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国际关系专业博士



Syed Hussain Shaheed Soherwordi
恐怖主义问题专家
白沙瓦大学国际关系系主任，教授
爱丁堡大学博士



Kate Tulenko
公共卫生安全专家
Corvus 医学咨询公司首席执行官兼创始人
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医学博士



Johannes Urpelainen
能源安全专家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 SAIS 教授
密歇根大学政治学博士



Vlado Vivoda
能源安全专家
昆士兰大学可持续矿产研究院研究员
弗林德斯大学国际关系博士



余乃忠
《全球非传统安全观察》特约编辑
长沙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博士



于铁军
国际安全理论专家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国家安全学系主任，教授
北京大学国际安全与和平研究中心主任
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副院长
北京大学国际政治专业博士



姚羽
网络安全专家
东北大学教授，博导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会评专家
国家 863 高科技计划会评专家
东北大学计算机学院博士



张金生
贸易安全专家
深圳市世贸组织事务中心原主任
中国社会科学院高级研究员
经济学博士、高级经济师



赵英
产业安全专家
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原主任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教授



周树伟
社会安全专家
广东国际经济协会高端智库专家
广东省人民政府参事室特约研究员
广东省商务厅原副巡视员



朱新光
社会安全专家
上海师范大学哲学与法政学院教授
东南亚研究中心主任
南京大学国际关系专业博士

研究员团队



艾尚乐
金融安全研究员
暨南大学国际关系学博士
暨南大学应用经济学博士后



程永林
金融安全高级研究员
广外广东国际战略研究院教授
暨南大学国际关系学博士
复旦大学金融学博士后



樊守政
恐怖主义问题高级研究员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副教授
南京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博士候选人



侯颖
社会安全研究员
暨南大学博士后
澳门大学国际关系学博士



晋继勇
公共卫生安全高级研究员
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
教授、副院长、博导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博士
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后



Ilan Kelman
风险与减灾研究员
剑桥大学哲学博士
伦敦大学风险与减灾研究所教授



李佳
文化安全研究员
浙江大学外国语言文化与国际交流学院
副教授
浙江大学管理学博士



陈永品
非传统安全治理研究员
广州开发区人才工作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中国科学院环境科学博士



陈玉梅
网络安全高级研究员
电子高级工程师
暨南大学政务大数据开放与社会创新创业
研究中心主任、博导
澳门科技大学管理学博士



侯建雄
海外利益保护特聘研究员
广东国际经济协会常务副会长
广东世能电力设备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广东省重大行政决策咨询论证专家



黄永弟
“一带一路”非传统安全风险研究员
广东金融学院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
广东金融学院粤港澳大湾区城市治理研
究所所长



Irfan Ullah Khan
人口安全研究员
浙江大学国际关系专业硕士
浙江大学非传统安全管理专业博士候选人



李方芳
全球健康与可持续发展研究员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全球健康外交顾问
阿姆斯特丹大学和巴塞罗那国际健康研
究所双博士



李乾
海洋安全助理研究员
中山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候选人



廖丹子
非传统安全理论高级研究员
浙江省数字安防与非传统安全研究院特邀研究员
浙江大学非传统安全管理专业博士



刘凤元
金融安全高级研究员
华东政法大学资本市场研究中心主任
国际金融法律学院教授



刘金山
经济安全高级研究员
暨南大学投资咨询（研究）中心主任
经济学院教授、博导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博士



刘天阳
非传统安全治理研究员
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副研究员
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哲学博士



刘元玲
气候安全高级研究员
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美国经济研究室助理研究员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博士



卢矜灵
东南亚地区安全研究员
广西民族大学东盟学院越南语信息员



麦方
财政安全高级研究员
广东省人大常委会立法咨询专家



Bakirov Maksatbek
中亚地区安全研究员
吉尔吉斯奥什国立大学硕士
浙江大学非传统安全管理专业博士



莫有恒
海洋安全助理研究员
武汉大学国际法学博士候选人



覃胜勇
公共卫生安全高级研究员
中山大学医学国际合作办公室主任
暨南大学国际关系学博士



Imran Ali Sandano
非传统安全理论研究员
巴基斯坦信德大学国际关系学助理教授
浙江大学非传统安全管理专业博士



Luis L. Schenoni
拉美安全研究特邀研究员
伦敦大学学院安全研究助理教授
圣母大学政治学博士



汤取安
海外利益保护特聘研究员
中城卫保安集团原国际部副总经理
国际注册信息系统安全专家（CISSP）
中国国家注册高级保卫师



Diana Toimbek
非传统安全理论研究员
哈萨克斯坦国际研究实验室高级专家
浙江大学非传统安全管理专业博士



王冕兴

社会安全研究员
广东省惠州市府办政策研究员
暨南大学国际关系学博士



王新和

北极问题高级研究员
青岛市社会科学院国际问题研究所副研究员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



王卓

社会安全高级研究员
四川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首席专家
中国西部反贫困研究中心主任
西南财经大学法学博士



谢法浩

社会安全研究员
暨南大学应用经济学博士后
暨南大学国际关系学博士



谢贵平

边疆安全治理高级研究员
国家社科重大招标项目首席专家
浙江大学中国西部发展研究院教授、博导
浙江大学非传统安全管理专业博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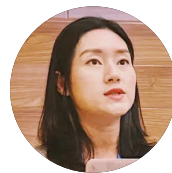
许涛

中亚地区安全高级研究员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亚研究室主任
研究员、博导
莫斯科国立大学博士



张建华

贸易安全助理研究员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经贸学院博士生



章雅荻

移民治理方向研究员
重庆大学新闻学院讲师
浙江大学非传统安全管理专业博士



赵欣

海外利益保护特聘研究员
广东信良兆诚律师事务所主任
广东法学律师研究会副会长



郑先武

区域合作安全高级研究员
南京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副院长、教授、博导
南京大学国际关系史博士



周龙

人口安全研究员
广外国际关系学院外交系主任
暨南大学国际关系学博士



周木亮

经济安全高级研究员
广州商务局国际招商处处长



钟晓君

经济安全研究员
广东技术师范大学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财经学院商务系主任，产业经济研究所所长
暨南大学经济学院经济学博士



周燕萍

贸易安全助理研究员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经贸学院博士生



周章贵

资源安全高级研究员
浙江大学非传统安全与和平发展研究中心国际水资源安全研究所所长
浙江大学非传统安全管理专业博士



邹冠炀

公共卫生安全高级研究员
广州中医药大学教授
英国爱丁堡玛格丽特女王大学博士

1 智库追踪

巴基斯坦再次陷入危机

■ 经济安全：金融安全

Amit Bhandari, 印度全球关系委员会能源及投资研究员。

自新冠疫情爆发以来，巴基斯坦一直处于动荡中，外汇储备下降和高通货膨胀在一定程度上也导致了领导人的下台。2022 年，巴基斯坦外汇形势严峻，以至于巴基斯坦国家银行已经停止开具进口信用证，并且负债累累。同时，巴基斯坦卢比的进一步贬值将推高通货膨胀率，目前通货膨胀率已经连续六个月超过 20%。除了政治和经济挑战之外，巴基斯坦的西

部边境面临着越来越多的安全问题。2022 年 12 月发生了一些来自阿富汗和俾路支省等国内各种叛乱的跨境袭击。2023 年对巴基斯坦来说仍然是充满危机的一年。

来源：
Pakistan in crisis, again | Gateway House | <https://www.gatewayhouse.in/pakistan-in-crisis-again/>

全球各国是时候重新思考国际发展融资问题了

■ 经济安全：投资安全

Simon Rynn, 皇家国防安全联合军种研究所非洲研究员。

在这个经济紧缩、民粹主义抬头和多极化趋势日益明显的时期，各国迫切需要对国际发展融资问题进行新的讨论，布里奇顿提案指出了一些关键的基本问题：发展中国家在经历了几十年的债务减免、痛苦的经济改革和可观的发展援助流入之后，再次陷入债务危机，这表明各国需要思考融资缺口。对此，布里奇顿提案提出的第一个问题是国际发展议程的适当性，尤其是联合国领导的可持续发展目标没有取得明显进展；第二个问题是

自 2008 年金融危机以来全球经济萎缩，西方的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增长。基于以上问题，加强国际发展融资可以在未来的国际发展议程中发挥一定作用，但更多更好的融资不会像以前的融资机制那样实现可持续的减贫。

来源：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Financing: Time to Think Afresh | RUSI | <https://rusi.org/explore-our-research/publications/commentary/international-development-financing-time-think-afresh>

核聚变能源处于十字路口

资源安全：能源安全

Jack Spencer, 美国传统基金会能源气候研究员。

近日，美国能源部部长詹妮弗·格兰霍姆宣布美国科学家已经达到了聚变能源研究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她认为这是对美国清洁能源未来的一个突破。广义的聚变研究，特别是核聚变，对美国的国家安全至关重要——核聚变研究有助于确保武器的安全性、可靠性和有效性，而无需进行实际测试。但是部分政客希望用于开发、商业化和部署商业应用的聚变反应堆——

这对国家安全和商业应用都是错误的做法。正确的做法是让核聚变在国家安全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为此，政府应继续为此目的进行研究。

来源：

Fusion Energy at a Crossroads | Heritage Foundation | <https://www.heritage.org/defense/commentary/fusion-energy-crossroads>

为什么国际气候峰会注定要失败？

生态安全：气候安全

Katie Tubb, 美国传统基金会气候能源研究员。

2022 年 COP27 聚焦灾难性的全球变暖，并呼吁各国制定政策，大幅减少人为温室气体排放。尽管西方民众普遍意识到气候变暖的危害，但可以说，近三十年的《巴黎协定》缔约方会议并没有在实现所宣称的减少全球温室气体排放的目标上取得多少成果，全球排放量仍然继续增加。尽管经济衰退，2020 年全球温室气体的浓度仍在增加，而 2022 年的温室气体排放则超越新冠疫情爆发前的水平。部分国家的零排放过渡计划更像是一种政策“赌博”，

即替代能源技术将在某段时限内被允许使用，但这场“赌博”并没有为应对气候变化带来实质性的贡献。总的来说，国际气候峰会的力量十分单薄，甚至注定会失败。

来源：

Why International Climate Summits Are Doomed to Fail, Part 1: Aspirations Untethered From Reality | Heritage Foundation | <https://www.heritage.org/environment/commentary/why-international-climate-summits-are-doomed-fail-part-1-aspirations>

要求在太空治理方面取得更多进展的呼声越来越高

疆域安全：空域安全

Doug Irving, 兰德公司传播分析师, 《兰德评论》主要撰稿人。

随着太空探索技术的不断进步, 每年都有新的国家或组织进入太空领域, 目前, 人类面临着更多空域治理问题。但目前国际社会在太空治理方面的条约和协议仍然不够完善, 国际法上对于太空治理的条款性描述比较模糊, 并未明确界定好太空治理的相关问题。随着技术进步以及开发太空的成本下降, 进入太空的门槛随之变低, 这也就意味着卫星相互碰撞的可能性和危害性将急剧上升, 缺乏太空治理的国际规范和程序极有可能造成灾难性事件。不久

前, 兰德公司的研究人员所得出的结论称, 面对日益严峻的太空灾难性事件, 世界各国将不得不就可核查、可执行的太空行为规则达成一致, 全球太空治理亟需解决以维持空间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

来源:

The Calls for More Progress on Space Governance Are Growing Louder |RAND|
<https://www.rand.org/blog/rand-review/2023/01/the-calls-for-more-progress-on-space-governance-are.html>

以色列社交媒体的监管

文化安全：话语权安全

Tamir Hayman, 国家安全研究所常务董事;

David Siman-Tov, 以色列情报界纪念和遗产中心国家安全研究所 (INSS) 高级研究员、情报方法研究所副所长;

Amos Hervitz, 国家安全研究所研究助理。

长期以来, 社交媒体是大多数以色列人日常生活中不可分割的重要部分, 社交媒体由于其显著的虚拟性特点, 极容易被不法分子当作传播不良声音、实施违法行为的重要工具, 甚至威胁到国家安全。近年来, 以色列政府也开始出台包括建立数字内容监管委员会、构建国家 - 社会 - 数字平台三角稳定关系等一系列行动以监管社交媒体的合法使用。但是, 修改社交媒体上的话语规范是一个长期且艰难的过程,

需要国家、新媒体公司以及社会公众的共同努力及联合行动, 以色列有关部门不仅要提高对不受限制的网络语言所带来的风险认知, 而且必须确定法律和公共步骤以限制不受限制的言论对社会的损害。

来源:

Regulation of Social Media in Israel |INSS|
<https://www.inss.org.il/publication/social-media/>

芬太尼正毒害着美国的青少年

■ 社会安全：药品安全

Lora Ries, 美国传统基金会边境安全和移民研究员;
Virginia Krieger, “反芬太尼之声” (Lost Voices of Fentanyl) 组织主席。

在美国的年轻人中存在着真正的公共卫生危机：这种危机的来源不是新冠病毒，而是芬太尼。每天有超过 300 名美国青少年被芬太尼毒害，这是一种极其致命的药物，经常被伪装成其他药物隐藏在美国年轻人服用的药物中。然而，美国大多数领导人拒绝谈论这个问题，更不用说努力阻止。美国公众需要了解因服用芬太尼死亡的青少年并不是典型的吸毒者，更

不是患有药物使用障碍的小孩子。芬太尼中毒正在毁灭一个个新的、没有成瘾的美国人，美国领导人仍然拒绝给予公共安全警告。

来源：
Our Children Being Poisoned Is the Real Public Health Crisis | Heritage Foundation |
<https://www.heritage.org/public-health/commentary/our-children-being-poisoned-the-real-public-health-crisis>

美联储效仿各个减税州的做法

■ 经济安全：财政安全

Preston Brashers, 格罗弗·赫尔曼联邦预算中心税收政策高级政策分析师。

在新冠疫情蔓延、俄乌冲突的国际大环境下，全球经济下行压力加剧，美国通货膨胀情况同样不容乐观，但是由于美国政府的结构性缺陷以及社会的不稳定因素增多，华盛顿的经济和社会调节功能失调，社会就业岗位流失、总体就业率下降，失业率升高，个人、家庭、企业的经济压力加剧。为缓解社会的经济困难，近期，美国数十个州陆续推行以减税为代表的调节经济的措施，通过减少税收压力以带动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但是，面对各州大力推行减税，华盛顿政府却予以怀疑甚至反对态度，以

保证美国政府赋税收入的稳定，在经济下行压力加剧的环境下仍然始终坚持高税收，这不仅摧毁了创新精神，使企业陷入困境，同时使得就业岗位流失，削弱了家庭的财富和福祉。联邦议员必须要重新审视所推行的税收政策，以避免高税收和通货膨胀对社会的危害。

来源：
Instead of Fighting Tax-Cutting States, Feds Should Follow Their Example | Heritage |
<https://www.heritage.org/taxes/commentary/instead-fighting-tax-cutting-states-feds-should-follow-their-example>

时代广场袭击事件提醒我们：恐怖主义仍然存在

■ 社会安全：大规模恐怖主义问题

Peter Brookes, 美国传统基金会反核扩散研究员。

虽然人们认为恐怖主义的威胁成为过去式，但近日在纽约时代广场的砍刀袭警事件却提醒我们：恐怖主义仍然存在。据报道，约有 30000 名 ISIS 战士被囚禁在伊拉克和叙利亚，如果他们被释放出来，极有可能重振曾经世界上最大的恐怖主义军队。同时，基地组织也仍然存在，在世界各地拥有恐怖分支机构。毫无

疑问，即使在一个紧张的大国竞争的时代，拜登政府也需要继续关注地方和区域恐怖组织。

来源：

Times Square Attack Reminds Us That Terrorism Still Looms | Heritage Foundation | <https://www.heritage.org/terrorism/commentary/times-square-attack-reminds-us-terrorism-still-looms>

超越基因组：非洲转基因作物及其对基因组编辑的影响

■ 生物安全：生物技术的研发应用

Dominic Glover, 农村期货集群负责人。

基因组编辑是一种有助于操纵生物体内遗传特征的植物育种技术，此项技术的应用不仅能够提高作物产量和营养价值，而且还可以促使作物有效应对旱涝灾害、病虫害等危害，因此，基因组编辑技术吸引了从事非洲农业发展的学者和专业人士的兴趣，基因组编辑技术与传统的转基因技术相比，在提高精度、降低成本以及提高速度方面存在优势，且基因组编辑技术有极大可能彻底改变育种技术。但是，过去利用转基因技术而生产出的转基因食品或多或少呈现出对于食品安全的危害。多年来，随着基因技术的不断进步，作物品种的改善极大促进了全球农业产能的增加，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伴随着水与肥料利用、土壤和作物管理、

以储存为代表的基础设施等的改善，栽培新品种将成为非洲地区应对气候变化影响的关键一步。但是，在应用新育种技术的同时，必须正确看待基因编辑技术以及新品种的优劣之处，反思通过基因技术生产的品种对于食品安全及生态安全的危害并吸取经验和教训，不断推动利用新基因技术缓和目前日益恶化的全球粮食危机。

来源：

Beyond the Genome: Genetically Modified Crops in Africa and the Implications for Genome Editing | IDS | <https://www.ids.ac.uk/publications/beyond-the-genome-genetically-modified-crops-in-africa-and-the-implications-for-genome-editing/> (2023-1-5)

2 前沿研究

俄罗斯的社会安全、安全困境和极端的反移民敌意

Mikhail A Alexseev

社会保障理论认为，当收容社区将移民视为对其群体身份生存的威胁时，就会出现极端的反移民敌意或移民安全困境。本文以对俄罗斯的调查研究为基础，分析社会安全、安全困境和极端移民困境的问题。

本文认为“驱逐所有合法和非法移民及其子女”的观点能够在俄罗斯崛起并在欧洲及其他地区获得广泛的公众支持是因为民众无法适应快速的社会变革。并且目前针对该问题的研究仍具有超出民族范围的极端态度，使得这种观点本身就具有仇外心理。

其次，当前的移民安全困境的理论也出现在俄罗斯、北欧和美国的反移民敌意比较研究和群体冲突中，其强调了在无政府状态下其他个人、团体或国家意图的不确定性。移民安全困境促使学界关注与其有关的政治和经济的不确定性，但是这些不确定性没有被明确界定为生存威胁。

本文提出要特别注意社区生存威胁和移民造成的对资源要求的威胁。在移民安全困境下，身份和经济的威胁会助长公众对大规模驱逐移民出境的支持，这种对个人福祉的威胁通常是不宽容的，进而演变为对整个社会的经济状况的威胁。

本文通过一系列相关研究证实了俄罗斯移民安群困境的逻辑，这些发现也增进了我们对个人、社会和政府如何应对移民的理解。移民是一个政策问题，对其的不确定性会直接引发极端敌对的政策偏好，因此我们需要关注与移民有关的经济和社会政策，而不是过于在意移民的身份。

来源：

Societal security, the security dilemma, and extreme anti-migrant hostility in Russia

Mikhail A Alexseev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2011), 48(4) 509–523

<https://journals.sagepub.com/doi/full/10.1177/0022343311406155>

编译：许汶

发现被忽视的：复原力的解放潜力

Marco Krüger

在安全研究的学术辩论中，复原力被不同程度地批评为新自由主义政府性的一种表现形式。它被认为是对个人的责任，同时主张国家责任的退出，其普遍的特征之一是责任的转移。责任的转移要么使受影响的社会实体（从个人、社会团体到整个社会）处于不利和压迫地位，要么使其获得解放和特权。本文认为，如果复原力能够被调动起来，以启动责任上的理想转变，那么它就会有解放的潜力，其中的解放被定义为废除边缘化和压迫社会结构。文章通过对德国灾害管理系统及其对依赖照顾的人的结构边缘化分析，讨论了复原力能够让至今被忽视的需求变得可见的潜力。

文章的案例研究表明，在传统安全环境中，被忽视的依赖照顾的人作为一个具有各种需求的异质群体，其需求超出了灾害管理的正常概念。他们被敦促自行组织救灾，以备不时之需。本文指出，尽管复原力政策存在各种缺陷，但通过将复原力的呼吁与对包容性和资源性的呼吁进行对比，复原力的解放潜力可能会颠覆当前部署的合理性。因此，需要在包容和社会

福利政治等领域找到提高复原力的方法，虽然这些领域与安全领域关系不大，但在决定个人能力方面发挥着巨大作用。复原力政策需要一种基于参与、代表性和包容性的可见性政治。

最后，文章指出本文论点的局限性。文章中提倡的可见性形式就其框架条件而言要求很高。只有在国家机构寻求改善人民生活状况的情况下，可见性才是可取的。相反，在压迫性政权下，让个人的需求被看见甚至可能加剧那些已经生活在不稳定状况下的人的脆弱性。此外，为了能够满足可见的需求，国家需要拥有适当的经济手段来支配。因此，可见性并不是解决社会不公正的万能药。但这可能是认识需求和确定实际责任分配的第一步。

来源：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Security (2022), page 1 of 20
doi:10.1017/eis.2022.24

编译：何香凝

Duggan Niall: 中非合作与未来外交关系展望

中国在全球经济中的重要地位意味着它将在非洲发展中发挥核心作用。其中，中国发展模式对非洲发展的影响最大。中国发展模式能够真正替代冷战结束后的西方发展模式。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中国模式比西方模式更好或更坏，也不意味着中国模式一定会引领非洲到达更高的发展水平。中西方发展模式各有优劣，适合不同的非洲国家。中国模式向非洲领导人展示了一个部分基于非西方规范和非西方价值观的成功模式，并让他们相信非洲发展模式是有望的。这种成功、可用的替代模式将有助于建立非洲机构，使非洲国家能够走自己的发展道路。

在未来的中非合作中，中国将反思其在世界中的新角色。现在的中国比2000年签

署《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宣言》时更加强大，中国在非洲的行动所产生的影响（包括积极和消极的影响）也比20年前要大得多。想要通过未来的中非互动来克服发展挑战，非洲国家就需要找出非洲与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国家的双边关系中的缺陷，并与最有能力处理特定问题的伙伴进行合作。该目的可以通过三边对话达成，也可以通过获取国家开发银行或亚洲投资银行的资助达成。

欧盟和中国在人权问题上的概念差距导致的误解让双方难以建立信任。如果没有对话与交流，冲突和竞争就必然出现。总的来说，非洲国家非常善于处理彼此之间的概念差距，这在过去几年非洲地区快速发展的区域合作中得到了证明。

法国、比利时、西班牙、葡萄牙、德国、荷兰等部分欧盟成员国和前成员国英国都在非洲有殖民主义遗产，波兰、爱沙尼亚等成员国在非洲没有任何殖民主义遗产，爱尔兰和芬兰则受其他欧洲国家的殖民统治。于是，这些国家在欧盟发展政策的总体方向上意见不

特邀学者



达根·尼尔，科克大学亚洲研究学院和政府与政治系博士毕业，现任爱尔兰科克大学政府与政治系国际关系、国际政治经济学和亚洲政治讲师。主要研究领域：东亚外交政策与国际关系、新兴大国在全球事务中的角色转变等，重点讨论全球经济治理、中国外交政策、南南合作、现有大国与新兴大国的关系。近期发表物有：《中国在非洲行为体的竞争与妥协：中国外交政策行为体的官僚政治研究》

近年来，日渐崛起的中国对包括非洲在内的发展中世界产生了愈发重大的影响。达根·尼尔聚焦影响中非关系与非洲发展的种种因素与各大主体，研究中国对非政策的构建与实施，对中非合作与未来外交关系进行展望。针对中非未来合作展望，中心对他进行了访谈。

一，也不知道如何克服来自非洲的安全挑战。它们往往以非常不同的方式建立国内援助结构、实施投资政策，相互协调变得困难。若欧盟成员国之间缺乏协调，成员国各自的国内政策可能会阻碍更广泛的欧盟政策生成。中国和非洲国家都可以利用这一点，支持最满足自身目标的成员国政策，消除欧盟层面政策的部分影响。

南非共产党几乎与中国共产党同时诞生。然而，身份的影响是很难衡量的，因为它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化，以反映更广泛的政治和社会问题。中国共产党在 20 世纪 40 年代至 70 年代的身份在中非关系建设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因为它有助于将非洲的解放斗争置于全球经济和全球资本的大背景下。在今天，尽管共产党的共同身份可以为两国关系的叙述提供历史框架、团结双方党员，但是很难衡量共产党的共同身份是否能帮助发展更加广泛的中非关系。共产党共同身份对中非关系发展的重要性的降低，可能是由于中国和非洲

的公众对彼此的文化和人民有了更多认识。

翻译：龙亦讯

Ahmed Moustafa: 俄罗斯在乌克兰危机中立场的真相

真实情况

我们不认为乌克兰的战争是自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以来最严重的国际冲突，因为无论是俄罗斯还是北约，各国都很聪明地避免自身被卷入其中。不幸的是，西方媒体的妖魔化言论总是声称俄罗斯会把在乌克兰境内的特别行动变成一场核战争。这些言论无非是在媒体上歪曲俄罗斯，并在世界范围内给俄罗斯以不恰当的刻板印象，使其失去其他国家的信任。

在北约看来，弗拉基米尔普京应对发动这场战争负责。他是一个非理性的且难以捉摸的侵略者，一心想按照前苏联的模式建立一个“大俄罗斯”。因此，他独自承担了对乌克兰危机的全部责任。但这个说法是错误的，普京在所有的媒体会议上都否认了这一点，并强调西方

国家特别是美国，对自2014年2月以来的危机负有主要责任。

除了美国在领导世界方面独树一帜以来的道德失衡，以及它在多国世界不可能发生的灾难和罪恶中的作用，包括2003年的伊拉克大屠杀，2008年可怕的金融危机和最近的新冠病毒，美国可能在其位于乌克兰的实验室中生产了冠状病毒。这是由拜登的儿子亲自支持。这些实验室最近在乌克兰境内被俄罗斯军队发现。

关于乌克兰的问题真正开始于2008年4月在布加勒斯特举行的北约峰会，当时小布什政府向联盟施压，宣布乌克兰和格鲁吉亚将“成为北约成员”。俄罗斯领导人对此立即做出了愤怒的反应，称这一决定是对俄罗斯生存的威胁，



Ahmed Moustafa 是来自埃及的经济学家并担任亚洲研究和翻译中心的国际青年教练，他于2021年获得了政治经济学的硕士学位，并对俄罗斯和伊斯兰世界的战略远景以及俄乌战争有着独到的见解。

乌克兰危机源自于北约和俄罗斯之间的相互斗争，且美国需要再其中担负相当大的责任。乌克兰危机在造成对俄罗斯经济制裁的同时也给全世界带来了能源危机。对于欧洲来说，能源缺口暂时无法通过替代性能源补偿，而俄罗斯则通过货币手段化解经济制裁对它的影响。与此同时，西方国家正利用其搜索引擎试图对中国和俄罗斯等国家进行污蔑，以不断挑起冲突。本中心就乌克兰危机问题对学者 Ahmed Moustafa 进行了独家访谈，询问他对其背后的原因，经济制裁在全球范围带来的影响和中俄的应对措施等问题的见解。

并发誓要挫败它。事实上，在2008年夏天和北京夏季奥运会期间，由普京领导的俄罗斯人挫败了格鲁吉亚的挑衅行为。俄罗斯人在那几天内给他们上了尊重他人主权的一课。这对西方国家接受其加入北约的意图是一个打击，并使得普京在与小布什的这场斗争中获胜。这一打击应该成为北约这些天的教训。

这些努力最终导致乌克兰爆发敌对行动和混乱——2014年2月，在拜登和他的儿子参与的起义（得到了美国的支持）后，《每日邮报》最近也报道了此事，以及Victoria Noland 导致号称亲俄的乌克兰总统逃离该国的事情。

作为回应，为了保护俄罗斯的利益和边界，根据大多数俄罗斯和鞑靼裔克里米亚公民72%的官方公投，俄罗斯被迫从乌克兰吞并克里米亚，并且还努力保护乌克兰东部顿巴斯地区的俄罗斯裔乌克兰人。

因此，双方在2014年和2015年建立了明斯克协议，

以解决顿巴斯地区的冲突和保护公民。这个协议是由乌克兰签署的，然而基辅不时地对顿巴斯的公民进行违反该协议的行为。

然而在2021年12月俄罗斯和北约的下一次重大对抗到来之前，其他对抗也在持续进行，但普京赢得了所有的对抗，特别是2020年的新冠大流行危机。在美国和英国之前，俄罗斯便已能够生产出针对新冠病毒的强效疫苗“斯普特尼克5号”。同时，“纳瓦尔尼”方案（“Navalny” scenario），以及因一些人权组织及美国和欧洲招募公司而引发的在“哈萨克斯坦”实施颜色革命的企图也于去年1月流产失败。所有这些都是在美国对乌克兰的挑衅之外积累的。

俄罗斯要求得到一份书面保证，即乌克兰永远不会成为北约的一部分，并且要求北约将撤走其自1997年以来在东欧部署的军事资产。然而随后的谈判失败了。

目前的问题是对俄罗斯方面失去了信心。西方和北约

不时地试图培养它，以阻止俄罗斯作为一个大国取得任何进展，并限制了其的作用，使其失去任何相当于美国或美国霸权的国际影响力。

普京先生没有低估俄罗斯的军事能力。根据俄罗斯国防部的每日报告，俄罗斯军队几乎摧毁了乌克兰的大部分军事基础设施，而北约无法对乌克兰实施任何（禁飞区）以及他们对对抗的恐惧与“泽连斯基”本人在几次电视采访中的证词就是证明。

制裁带来的全球和地区经济后果

制裁的过程又给西方国家带来了意想不到的社会经济影响。他们未经深思熟虑就匆匆忙忙地对俄罗斯联邦进行单边制裁。值得注意的是，《联合国宪章》第七章中没有所谓的经济制裁，由于欧美国家以“个人主义”为原则，制裁影响了世界上所谓的食品供应链，特别是以面粉、石油、糖等为代表的基本材料。

坦率地说，俄罗斯是世界上最大的小麦生产国，也是食

用油最大产生国家之一。因此，欧洲和美国的消费者竞相囤积这些商品。由于他们对战争的悲观看法，当他们很快感到饥饿和寒冷时，便会发起大规模的示威活动，以抵制这些对俄罗斯的闹剧般的制裁。

影响最大的是能源问题，这是因为俄罗斯是世界上最大的能源生产国，据官方统计，欧洲消费的天然气有40%来自俄罗斯的出口。

相应地，天然气和加油站的燃料价格已经达到了比2014年同类产品高得多的价格。在经历了因新冠疫情而导致的世界萧条，以及市场对再次恢复经济增长的渴求后，欧洲和美国目前都将难以获得任何能源的替代品。而在伊朗的拖延下，作为俄罗斯联邦以及中国的盟友，伊朗要求在与西方签署名为(5+1)的协议之前先解除所有制裁。

海湾国家，特别是沙特阿拉伯和阿联酋，也很难执行西方国家的任何要求来向西方提供任何能源。而几周前在卡塔尔举行的天然气峰会见证了这

一点，因为会议认定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取代俄罗斯对欧洲的天然气。

海湾地区的争端，特别是沙特阿拉伯与民主党拜登关于美国与伊朗的协议和沙特记者Jamal Khashoggi被杀的问题也导致能源供给问题的困难。此外，俄罗斯在新冠疫情之前支持欧佩克的立场。欧佩克支持海湾石油国家使得石油价格目前处于历史最高价格。这类似于1973年10月对以色列的西奈解放战争的情况，使得它在叙利亚、也门和其他国家的损失得到补偿，以支持美国在那里的议程。

卢布和人民币正在取代美元

随着俄罗斯人要求用“俄罗斯卢布”来支付俄罗斯向“不友好国家”出口的能源和其他东西的价值，普京已经混淆了对欧美对手的棋盘，因为有些人必须取消对俄罗斯的制裁。

他们要么用卢布购买俄罗斯债务债券，要么在俄罗斯银行开立卢布账户，要么用俄罗斯可以接受的黄金购买石油。

简单地说，俄罗斯从制裁中获得的经济利益多于对它的伤害，而西方国家实施的制裁对价值小于俄罗斯的国家不起作用，如古巴，委内瑞拉，伊朗和其他国家。

美国人目前有很大的恐惧，特别是在俄罗斯要求用卢布支付，以及在中国国家主席习和穆罕默德·本·萨勒曼最近就石油交易达成协议后用中国人民币交易后。因此，美元将与石油价格脱钩。这种联系是美国国务卿基辛格自七十年代在埃及和阿拉伯人于1973年10月击败犹太复国主义实体后，通过1975年的所谓牙买加会议实施的。

在那里，欧佩克国家有义务将他们的生产与美元挂钩，这也是使美元成为迄今为止最有影响力的货币的原因。但是这反过来又影响了全球货币金融体系以及美联储。这些机构使美国在世界面前拥有巨大的权力，使帝国处于崩溃的边缘。

对中东事务的影响

埃及的领导层在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保持中立，这是

因为埃及与这两个国家关系良好，且他们也是埃及最大的小麦和油料出口国。同时，埃及和俄罗斯之间存在战略伙伴关系。但在大多数埃及人民看来，俄罗斯总统普京是埃及领导人贾迈勒阿卜杜勒纳赛尔的延伸，他所做的是恢复世界上所有被压迫人民的尊严，和任何受尊重国家的独立代价。值得注意的是，普京在阿拉伯世界非常受欢迎。

“而且我们不应忘记，上世纪中叶的俄罗斯（前苏联）是阿拉伯世界的核心，并且支持阿拉伯世界。从世界银行拒绝为埃及南部的阿斯旺高坝项目提供资金开始，它在巴勒斯坦问题这个世纪问题上有令人尊敬的人道主义立场。我们也不应忘记俄罗斯在叙利亚打击恐怖主义的作用。”这被认为是对美国、英国和以色列在那里的所有计划的打击，也是普京自2013年以来战胜北约的领域之一。

跨国技术公司的影响和建议的解决方案

关于我曾经写的跨国技术

公司的影响和建议的解决方案，我认为在包括俄罗斯和中国在内的新兴大国面前，最重要的弱点之一是在全球范围内的媒体存在有限。尽管有以下公司代表的经济、战略和技术实力，如中国的电信巨头“华为”和“中兴”，以及俄罗斯的“Yandex and VK”。但是世界上最大的互联网（搜索引擎）依旧是美国的“谷歌”。

因此，谷歌和美国的互联网公司过滤和阻止包括（Meta）在内的一切关于中国和俄罗斯的正面信息。而当我们试图在任何一个Meta平台（Facebook或Instagram）上客观地发表批评美国及其与俄罗斯人的立场的文章时，就会以任何不可靠的借口（这篇文章不符合我们的出版标准）被阻止。另一方面，俄罗斯、中国、伊朗和其他国家每天都受到西方的批评和侮辱。

对此目前别无选择，只能计划为东方和南方国家创建一个新的强大的中俄搜索引擎和信息引擎来作为谷歌的替代品，并动员这些国家所有有意识的青年参与到这个“世纪工程”

中来。

在这里，这个信息引擎将通过它的平台为南方和东方的媒体服务。这些平台将在我们遭遇到谷歌盗窃知识产权，或对事实进行混淆、封锁和伪造的情况下建立，正如谷歌对俄罗斯和中国不断进行的做法一样。同时，它也被认为是一个非常强大的防御防火墙，为参与这个项目的国家的数字和网络主权服务。最后，我希望能成为建立这个世纪项目的一方。

翻译：周凌展

丁思齐 刘国柱： 大国竞争时代的美日科技合作

在国际关系领域，国际秩序、国际格局、国际规范等的变迁以及大国的兴衰通常与科技变迁联系在一起。第一次工业革命起源于英国，奠定了英国在世界近代史上长期领先及其首个全球霸权国家的地位；第二次科技革命中德国和美国后来居上，国家实力的变化使得德国崛起于欧洲大陆并开始挑战英国的霸权地位。而美国的崛起也使得美国主导的美洲体系成为国际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二战后美国在第三次科技革命中的主导地位，不仅保证了战后美国的经济繁荣，也使得美国在对苏冷战中占据上风。科技革命决定了国家的实力与地位，更决定了国际格局的走向。面对以数字技术为核心的新一轮科技

革命，以及大国竞争的时代背景，世界主要大国纷纷制定自己的科技发展战略，试图抢占新一轮科技革命的制高点，确保本国在大国竞争格局中的竞争优势和实力地位。在这种时代背景下，美日科技合作的大幕徐徐拉开。

2021年4月16日的美日领导人联合声明指出，美国和日本均已认识到，数字经济和新兴技术具有改变社会和带来巨大经济机会的潜力，因此美日将深化在生命科学和生物技

术、人工智能、量子信息科学和民用空间领域的合作，以提升国家竞争力。2021年5月，美日决定建设美日全球数字连接伙伴关系。2021年11月的美日互联网经济政策合作对话再次强调了在新兴技术领域合作的重要性，并提出通过多边接触的方式来优化全球数字经济政策环境。在美国看来，美日科技合作一直是美日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双方在新能源技术、超级计算和关键材料等领域的科学研究方面进行了超

过25年的富有成效的合作，而且美日在科技领域的伙伴关系涵盖了两国和国际社会面临的一系列广泛复杂问题。

本文试图对大国竞争背景下的美日科技合作展开讨论，旨在厘清美日科技合作的动力、合作领域、合作特征，以及合作前景。关于本文所要讨论的问题，现有研究主要以国外研究为主，且主要集中在智库界。国内学者的讨论相对较为有限，归泳涛只在探讨经济领域的美日对华战略时简单论

研究员介绍



刘国柱，浙江大学世界史所教授，浙江大学非传统安全研究中心研究员，圣皮耶国际安全中心顾问团队成员；丁思齐，浙江大学世界史所博士研究生。

美日加强在大国竞争时代的科技合作主要出于三方面的考量，即美国旨在通过国际合作巩固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日本旨在通过加强美日科技合作来推动日本在新兴技术领域的发展和加速日本的数字化转型到来；美日双方共同希望通过科技合作来强化美日联盟关系。美日科技合作主要集中在军事科技、通信技术、量子技术、半导体以及太空科技领域。以“印太”地区为重要地缘指向、强调私营部门的作用、注重规则建设是美日科技合作表现出的主要特征。美日科技合作的前景受到美国国内政治不确定性、美日在部分具体领域上的分歧、美日两国各自的敏感科技信息管理制度等因素的制约。

及。

一、美日科技合作的动因

新兴技术的巨大社会、经济影响潜力是美日加强在科技领域合作的根本性动力。除此之外，美日加强在科技领域的合作也有其他方面的考量。

首先，对美国来说，需要通过国际合作来巩固美国的科技领导地位。在拜登政府看来，“技术的快速变化将塑造我们生活的各个方面和我们的国家利益……美国必须重新加大投资以保持我们的科学和技术优势，并再次领先”。采取多边

主义的方式，与美国的盟友和伙伴进行合作被拜登政府视为美国能够抓住技术进步所带来机会的关键之道。利用分析软件 VOSviewer 对拜登政府发布的《过渡性国家安全战略指导方针》进行文本可视化分析，可发现“盟友”（ally）与“伙伴”（partner）正是该方针的关键词汇（见图 1）。这进一步证明了拜登政府战略体系中国际合作的重要地位。这种观点也几乎是美国精英的共识，得到了美国政界、学术界、企业界精英的普遍高度认同。值得注意的是，这也被视为特朗普政府和拜登政府的跨政府共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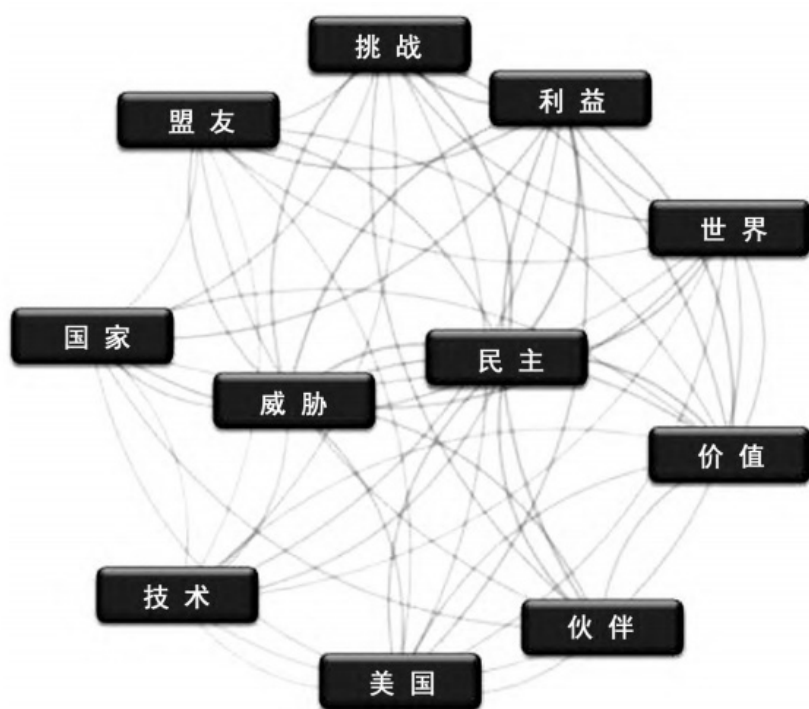


图 1 《过渡性国家安全战略指导方针》的文本可视化分析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因为特朗普政府在2020年10月发布的《关键与新兴技术国家战略》同样反复强调了美国盟友和伙伴的重要作用。

正是基于这种认知，拜登政府还推出了所谓的“科技联盟”（alliance for science and technology）战略，旨在确保对华有效技术遏制和封锁的同时，试图全面强化美国在科技领域的全球领导地位。日本则被视为美国科技联盟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美国智库直接点名的“科技联盟”成员，并指出美国应优先同日本等国展开合作。因为日本长期以来都在世界科技版图中占有一席之地，

是国际科技格局中不容忽视的重量级玩家。日本是仅次于美国和中国的第三大研发投资国（见图2），2020年日本的全球专利数量同样位居世界第三。日本公司在美国的研发资金也比其他任何国家的公司都多。在拜登政府重回多边主义路径，强调与盟友合作的战略背景下，美国加强与日本这个长期以来在国际科技版图中占有一席之地的传统盟友的合作也在情理之中。

其次，对日本来说，需要通过加强美日科技合作来推动日本在新兴技术领域的发展和加速日本的数字化转型。在

日本看来，经济问题是大国战略竞争的核心，掌握前沿的新兴技术将是这场竞争成功的关键。因此日本将控制新兴技术作为优先事项。但对于当前的日本来说，仅仅依靠自身的力量就站在新兴科技的前沿却是非常困难的。因为日本虽然长期以来都是国际科技格局中的重量级选手，但近年来日本的科技发展却在一定程度上陷入了瓶颈。瑞士日内瓦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世界知识产权指标显示，2018年、2019年、2020年连续三年日本的全球专利申请数量均呈现下滑态势。肆虐全球的新冠肺炎疫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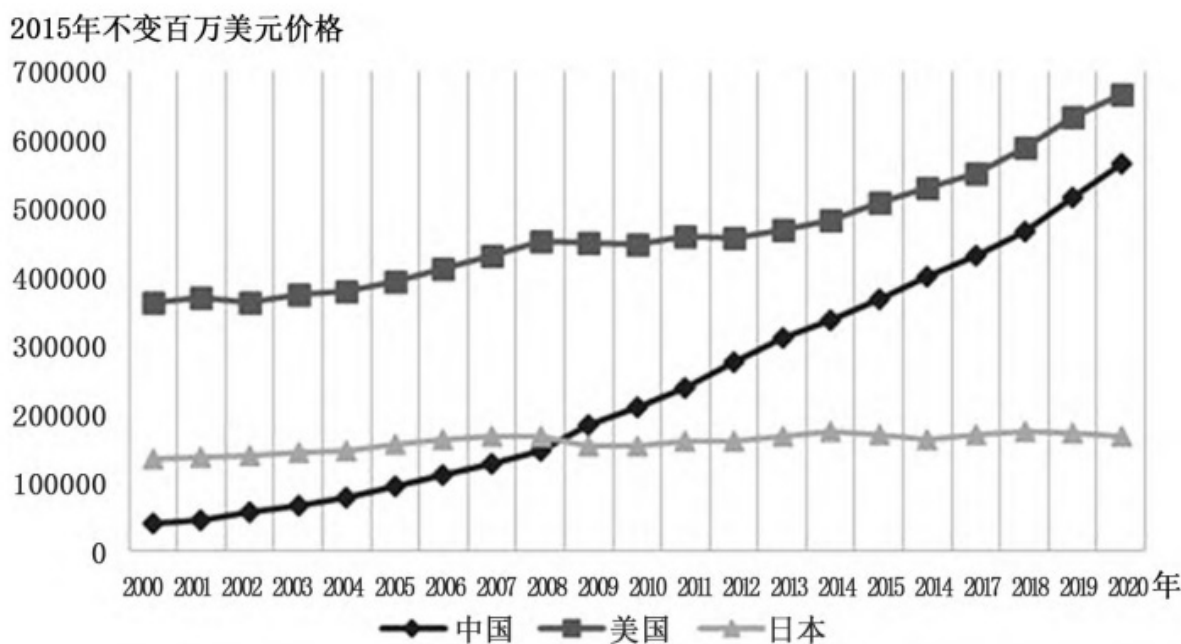


图2 中美日研发投入

资料来源：OECD, “Gross domestic spending on R&D,” <https://data.oecd.org/rd/gross-domestic-spending-on-r-d.htm>。

情更是暴露出了近年来日本数字化转型迟缓的问题。这从日本2020年还在使用传真机统计新冠确诊病例数量便可见一斑。据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发展学院发布的全球数字竞争力排名,日本2020年的全球数字竞争力排名已从2019年的第23名下降到第27名,2021年进一步下降到第28名。与此相比,中国在2020年和2021年均有明显进步,已上升到全球第15名。数字化和通信技术发展的缓慢也制约了日本的疫情防控和企业及社会活动。于是,日本决定加速数字化转型,并将之视为推动经济恢复的关键。而发展新兴科技的“孤掌难鸣”则使得日本意识到,“任何解决方案都应该是合作和多边的”,而且要“为志同道合的国家之间的合作提供渠道”。日本政府于2021年3月制订的《科学技术与创新基本计划》明确提出,要与美国和欧盟等科技水平高的发达国家进行国际合作,以加强日本的研究能力。在一些日本学者看来,美日应进行联合创新,寻求在对方的创新生态系统中

进行合作,以使双方科技合作的利益最大化,而且美日还必须促进先进技术在军事、工业、信息和通信方面的创新应用。总之,对渴求科技进步的日本而言,加强与美国这个当今头号科技强国的科技合作是必不可少的。

最后,强化联盟关系也是美日双方在大国竞争时代的共同需要。近年来,因自由霸权战略或“美国首要”(American Primacy)战略在实践中遭遇巨大挫折,美国国内的“新孤立主义”论调和战略收缩论声势日益高涨。这些观点高度质疑美国传统同盟体系的价值和作用,这在特朗普政府的同盟政策中可以看出。但在作为建制派代表的拜登政府眼中,同盟体系依旧是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核心一环。现任美国国务院中国政策高级顾问米拉·拉普-胡珀(Mira Rapp-Hooper)在其所著的《共和国之盾:美国联盟的胜利与危险》一书中,就全面肯定了美国所谓的史无前例的联盟体系所获得的巨大成功,认为美国联盟体系并没有失去价值,只

是需要改革。作为她的观点在拜登政府政策议程中的回响,拜登政府明确指出,“我们将重振我们在世界各地的联盟和伙伴关系并使之现代化”。

由此,拜登政府上台后开始着手修复特朗普政府的“美国优先”政策对美国联盟体系所造成的冲击和裂痕。日本是美国在“印太”地区的头号盟国,美日联盟关系的修复无疑将是拜登政府对外政策的重要议程。而对于右倾化日趋严重的日本来说,加强美日联盟关系,借助美国的力量对冲乃至遏制中国崛起自然也将成为日本政府对外政策议程的重要议题。这种观点也是日本国内观念市场中的重要力量,为不少日本学者所认同。所以,2021年4月16日的美日领导人联合声明“再次承诺建立一个不可磨灭的联盟”。显然,加强美日在科技领域的合作将有助于修补并强化美日同盟关系,因为这会带来美日合作领域的拓宽,以及互动频率的增加。在这种情况下,美日领导人联合声明将加强在新兴技术领域的合作确定为美日关系的重要

议程也就不足为奇。

二、美日科技合作的领域

美日科技合作主要集中在军事科技、通信技术、量子技术、半导体以及太空科技领域。

第一，军事科技。对于富有浓厚军事同盟色彩的美日关系来说，在军事、国防科技领域的合作一直是美日安全关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美日在军事科学技术领域的合作最早可追溯到朝鲜战争时期，朝鲜战争后的1954年《共同防御援助协定》（Mutual Defense Assistance Agreement）则奠定了美日国防工业合作的基础。合作初期，由于战后日本经济和科技尚未“羽翼丰满”，所以双方合作主要以美国对日本单向技术输出为主，这种情况直至20世纪80年代才有改变。随着美国获得日本技术的意愿增强，1980年两国成立了系统与技术论坛（S&TF），以探索军事技术领域可能的联合研发项目。1983年，美日签署了《互相提供军事应用技术协议》，允许日本向美国（实

际上只有美国）转让军事技术——作为武器出口“三原则”的例外。这也表明美日军事科技合作走向了双向流动、相互吸收的新阶段。此后，美日在军事科技领域的合作不断加深。双方联合进行了导弹防御系统的开发和部署，以及军舰隐形和其他先进科技的联合研究。

在大国竞争时代，面对所谓的“中国军事威胁”，美日决定进一步深化在军事科技领域的合作，计划签署一项新的关于防务研发的合作协议。日本学者也积极呼吁美日加强军事科技合作，“为了确保新型军事能力和基础技术的创新能够增强而不是降低该地区的安全，美国和日本必须加快并加强长期以来以军事和国防为重点的协调与合作”。日本还建议将无人系统、高超音速/超高速导弹（hypersonic/hyper-velocity missiles）和人工智能的国防应用视为美日军事合作最重要的三个领域，因为这三个领域正是中美军事科技竞争的核心领域。同时，高超音速领域内的合作也正是美国国务

卿布林肯所强调的美日防务合作的重点领域。总的来看，美日在大国竞争时代的军事科技合作已经展开，并步入实际行动阶段。例如，美国航空航天巨头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已被委托为日本开发一种名为F-X的下一代战斗机提供技术支持。除此之外，美日还正就模块化混合动力汽车系统、下一代两栖技术、高温外壳技术进行联合研发，并围绕爱国者PAC-2的零件、宙斯盾系统的软件和部件、F100发动机配件、F-15惯性导航单元展开技术转让。

第二，通信技术。美国和日本都是传统通信技术强国，曾引领了一定时期内通信技术的发展。但在5G技术方面，美日却似乎已然落后于中国。2022年2月16日，美国哈佛大学教授格雷厄姆·艾利森（Graham Allison）和谷歌前首席执行官（CEO）埃里克·施密特（Eric Schmidt）在《华尔街日报》上撰文指出，美国在5G领域的几乎每个方面都远远落后，而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国家则遥遥领先。具体来

说，美国的平均5G移动互联网速度约为每秒75兆比特，但在中国的城市，这一速度为每秒300兆比特；在全球5G服务市场上，中国30%的市场份额也超过美国；美国在5G基础设施建设、对5G的投资上也落后中国。尽管他们的观点有夸大美国落后趋势、中国领先趋势之嫌，但无疑反映出了美国各界对美国在5G时代落后的强烈担忧。日本顶级通信公司NTT Docomo仅拥有约6%的5G专利——华为与高通则分别拥有10%。日本政府也对日本在5G竞赛中起步较晚感到遗憾，“即使我们拥有更好的技术，我们也无法赢得市场份额的竞争”。

在这种背景下，一方面为了与中国进行竞争，另一方面则为了避免重蹈5G竞争失利的覆辙，试图抢占下一代通信技术的制高点，美日决定在通信技术领域展开合作。政策层面，2021年4月16日的美日领导人联合声明重申了美日对5G的安全性和开放性的承诺。2021年11月的美日互联网经济政策合作对话指出，美

日均认识到在发达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促进5G网络开发和部署合作的重要性，还打算继续在5G网络安全国际论坛上进行协调，并共同努力推进和促进电信供应商的多样性。行动层面，美日已决定共同投资45亿美元，其中美国25亿美元，日本20亿美元，用于开发下一代通信技术。美日还计划联合澳大利亚在南太平洋地区建设5G网络，以遏制中国对该地区通信网络的影响。最后，美日在5G领域的合作也有助于解决双方在5G领域内的一个共同缺陷，即美日均缺乏一家完整的5G电信供应商。美国不再有制造基站的公司。日本公司尽管在硬件和软件供应链的特定节点上享有竞争力，但它们不以垂直整合的平台（vertically integrated platform）运作。

第三，量子技术。作为重要的新兴技术领域，美日均对量子技术给予了高度关注。美国已经将量子计划与人工智能、5G、先进制造一道视为能够影响未来美国繁荣与安全的“未来产业”。在日本看来，

日本未来的增长和发展将取决于量子技术的发展，但如果日本不采取积极措施则可能落后于其他国家。量子计划也是大国竞争时代美日科技合作的重要领域。2019年5月的美日科技合作高级别委员会联合会议呼吁在人工智能、量子技术、外层空间等领域加强双边合作。2019年12月19日，美日联合发表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量子合作东京声明》，认为“量子信息科学与技术具有彻底改变我们对基本现象的理解”的潜力。《量子合作东京声明》也标志着两国正式确定了共同在量子技术领域展开科技合作的承诺。日本于2020年1月提出的《量子技术创新战略》将国际合作——强化与美国、欧洲的国际合作——确定为五根战略支柱之一。2021年6月17日，美日举办了科学技术合作联合工作委员会会议，并签署了量子信息科学项目安排。该安排将促进美日双方在量子通信、计算、仿真、设备、传感器、代工厂和材料等子领域的研究和开发。可见，美日在量子技术领域的

合作已经从擘画蓝图阶段走向具体实施阶段。

第四，半导体。半导体一直在美日科技合作关系中占据特殊位置。美日在20世纪末的经贸纷争很大程度上就与

双方在半导体领域内的纷争有关。美日是传统的半导体强国，均在世界半导体领域中占据着重要份额。不过因种种原因，21世纪以来，日本在全球半导体领域的实力和话语权的

都有明显的下滑。据图3和图4可见，无论是在价值链上还是晶圆制造能力上，日本均已落后于韩国。在半导体领域内，美国则被认为面临着来自中国的严峻挑战。根据波士顿咨询集团（Boston Consulting Group）的数据，中国的市场份额将从2020年的15%增加到2030年的24%，成为世界上市场份额最大的国家。

在大国竞争时代，确保敏感供应链的弹性和安全是美日共同战略目标。因此，美日决定加强在半导体领域这一敏感供应链领域内的合作。2021年4月16日，美日领导人在联合声明中宣称，“我们还将继续在敏感的供应链（包括半导体）方面进行合作，促进和保护对我们的安全和繁荣至关重要的关键技术”。在日本看来，加强国际合作，如通过与海外半导体公司建立合资工厂的方式来确保国内半导体制造业的基础，也正是确保半导体供应链安全的重要方向。值得一提的是，半导体也可以说是大国竞争时代美国及其盟友可以卡中国“脖子”的最重要的“科技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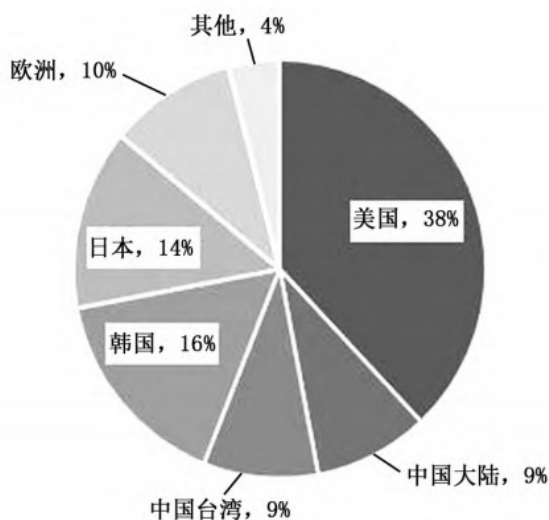


图3 半导体价值链份额

资料来源：Antonio Varas et al., “Strengthening the Global Semiconductor Supply Chain in an Uncertain Era,” Boston Consulting Group and Semiconductor Industry Association, April 7, 2021, BCG, April 1, 2021, p. 31, <https://www.bcg.com/ja-jp/publications/2021/strengthening-the-global-semiconductor-supply-chai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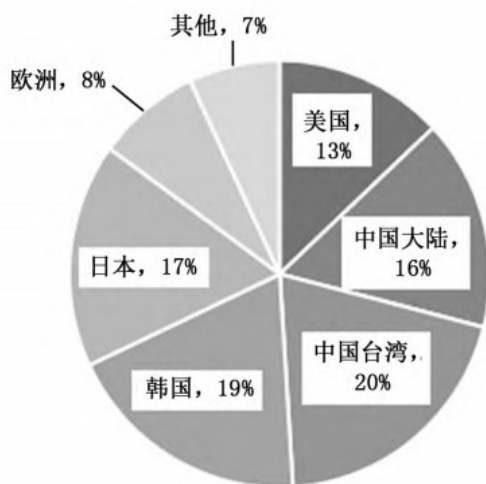


图4 2019年全球晶圆制造能力

资料来源：Antonio Varas et al., “Strengthening the Global Semiconductor Supply Chain in an Uncertain Era,” BCG, April 1, 2021, p. 35, <https://www.bcg.com/ja-jp/publications/2021/strengthening-the-global-semiconductor-supply-chain>.

器”，因为“半导体行业目前处于国际上对中国的技术野心和供应链的脆弱性日益关注的核心”。

第五，太空科技。美日在太空科技领域是长久的合作伙伴。自1969年美日签署第一份太空技术合作协议以来，日本已成为美国在航空航天领域至关重要的合作者。太空合作在美日同盟架构中的地位也越来越重要。2015年4月修订的《日美防卫合作指南》首次设立了关于空间和网络空间合作的独立部分。再如，美日通过组建“太空部队”进一步加强在太空领域的合作，试图在大国竞争时代争雄脆弱的高边疆。2018年8月，日本宇宙航空研究开发机构（JAXA）和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签署了一项关于“月球及其以远探测合作工作的联合声明”。2019年5月的美日关于科技合作的联合声明指出，“双方鼓励科技利益相关者在日本政府的登月研究与发展计划下探索新的合作途径”。2019年9月，日本宇宙航空研究开发机构与美国国家

航空航天局就月球探测合作发表联合声明。2020年7月的美日空间问题全面对话第七次会议决定进一步加强双边空间合作，扩大在空间安全、空间态势感知、空间探索、商业空间活动、全球导航卫星系统等多个领域的双边合作，而且，双方在太空领域的合作出现了一定的机制化和常态化特征。例如，由美国和日本空间政策专家和官员组成的美日空间论坛（USJSF）每年举行两次会议。除了民用太空合作，在应对所谓的“中国威胁和朝鲜威胁”的推动下，美日近年来还积极展开太空军事合作，赋予了双边太空合作的浓厚军事安全色彩。双方在机制构建、装备共用、能力对接等维度积极推进太空军事一体化，以促进美日太空军事体系全面融合。

三、美日科技合作的特征

大国竞争时代的美日科技合作呈现以“印太”地区为重要地缘指向，强调私营部门（Private Sector）的作用，注重规则建设等特点。具体如下。

第一，以“印太”地区为重要地缘指向。在美国和日本的战略布局中，“印太”地区均具有重要地位，是两国资源投入和地缘合作的关键区域，日本也可被视为美国盟友中在“印太”地区与美国合作最为密切的存在。2021年4月16日的美日领导人联合声明第一条就指出，“打造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因此，“印太”地区自然也成为美日科技合作的重要地缘指向。早在2018年，美日就联合发表了关于推进“印太”地区数字互联互通合作的联合声明，承诺在第三国的基础设施方面进行合作，包括支持所谓的“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的数字基础设施。美国已将“印太”地区确定为高质量基础设施增长的重要地区，这将促进新兴技术的扩张，但从电子商务到5G硬件，中国在多个领域占据主导地位，这在很大程度上遮盖了“印太”地区的技术发展，因此美日伙伴关系将寻求纠正这种失衡。即便是美日太空合作，有观点也建议以“印太”地区为重要的地缘指向，例如，加强与东南亚国家合作，帮助东南亚地区国家建立自己的太

空问题解决能力。不过，有观点指出，虽然美日之间的数字合作主要集中在“印太”地区，但美日技术合作的许多现有举措和框架可以很容易地扩展到如拉美地区等美日感兴趣的其他地区。因此该观点建议美日推进在拉丁美洲地区的数字经济合作。美日也注意到了应扩展合作地域，2021年5月的关于启动美日全球数字连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就明确提出，要加强在非洲、拉丁美洲和其他地区的第三国合作。

第二，强调私营部门的作用。美日双方一致认为，私营部门将在双方的合作中起到重要作用并扮演重要角色。因此，如何充分发挥和利用私营部门的作用也是美日科技合作议程中的重要议题，甚至部分观点将私营部门视为美日科技合作的决定性力量。这是因为，美国所有研发资金中约有70%来自企业，而在日本则约为80%。2018年美日关于通过能源、基础设施和数字互联互通合作推进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联合声明就专门提及了美日私营部门在“印太”地区的合作。

2021年11月的美日互联网经济政策合作对话不但包括美日两国私营部门的代表，而且公私合作伙伴关系被确定为重要的对话议程，并且美日两国欢迎两国的私营部门向两国政府提交联合声明。围绕如何扩大在“印太”地区的清洁能源合作，两国都承诺将讨论如何通过美国和日本机构与私营部门之间的密切协调，以可负担和有效的方式向区域合作伙伴扩大清洁能源技术的使用和部署。私营部门在美日太空合作中也扮演着重要角色，如美日空间论坛“反映了私营部门在国家空间能力方面日益重要的作用，在有利于创造性和坦率讨论的非正式环境中，综合了包括公司、学术界和其他非政府行为者在内的各种专家的观点”。两国私营部门在量子技术领域的合作更是美日量子技术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人工智能领域亦如此，美日双方私有部门的参与感明显。而且两国私有部门在人工智能领域的合作实际上要比两国政府“走得更快”，因为两国政府在人工智能领域的实质性合作相对较为有限，

更多的只是处于观望和“谋篇布局”阶段。有观点指出，美日两国能否引领6G的发展，其中的关键之一就是与私有部门密切和持续的磋商。还有观点指出，为了充分地促进双方公共和私有部分之间的整体协作，美日应考虑建立一个双边的公私跨学科机构，以支持美国和日本的最高决策者。

第三，注重规则建设。在产品—技术—规则链条中，规则是处于金字塔顶端的。因为制度非中性特性决定了，规则一旦被确立，就将给予制定者额外的优势和收益。这也就是为什么当今的大国竞争充斥着大国规则、制度竞争。主要大国均试图制定有利于己的国际规则、国际制度、国际规范，特别是将自身的国内规则、国际规范上升为国际规则、国际规范，从而进一步赋予自身先发优势。美日科技合作在这种背景下也带有浓厚的规则建设色彩，即美日科技合作不仅局限于科学、技术层面的合作，更试图联合制定相关领域内的治理规则、规范。

美日在关于通过能源、基

基础设施和数字互联互通合作推进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联合声明中强调,要加强标准制定,即“在七国集团、二十国集团和亚太经合组织等国际论坛上推广高质量基础设施的国际标准”,“推广公共采购的国际最佳实践”。第十二届美日互联网经济政策合作对话的联合声明反复提及了规则建设,如“两国打算加强在‘超越 5G’技术方面的合作,包括研究、开发和国际标准”,“强调有机会指导国际电联在推进互联互通、制定国际电信标准和弥合数字鸿沟方面的未来工作”,“两国都打算继续与国际伙伴合作,促进支持国际数据流的规则”。2021年4月16日发布的“美日竞争力和韧性(CoRe)伙伴关系”声明指出,“加强美国和日本信息与通信技术(ICT)专家在全球标准制定方面的合作和信息交流”。美日同样将国际规则建设视为双方太空合作的重要领域。凡此种种均可以说明,规则建设已然成为美日科技合作的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值得一提的是,阻止或阻挠中国的国际规则建设也是

美日科技领域规则建设努力的重要目标。有观点指出,“阻止中国在2022年接任联合国领导的国际电信联盟主席国,应是美日以及其他四边机制国家和民主国家的首要任务。此举将对中国到2035年实施‘极权主义’影响的技术标准的目标造成重大打击,同时表明美日技术标准合作得到加强”。

四、美日科技合作的制约因素与前景

总之,尽管美日两国都有动力推动在新时代的科技合作,两国在部分领域内的合作也已经展开,未来两国之间的科技合作可能依然会受到以下因素的制约,从而增加两国科技合作的不确定性,使得合作前景充满变数。

第一,美国国内政治的不确定性。“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根源于严重的经济不平等和显著的贫富差距,政治极化、两党对立、白人至上主义、民粹主义、身份政治等问题近年来在美国国内政治生活中愈演愈烈。美国国内政治秩序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了“礼乐

崩坏”的情形,这也直接导致了美国内政外交的不确定性,即政策延续性存疑,从而使得美国的战略信誉、战略可信度在国际舞台上受到了严重损害。对美日科技合作而言,虽然在强调多边主义路径的拜登政府任内,美日科技合作已经徐徐展开,但如果未来“特朗普冲击波”卷土重来,华盛顿重新由主张单边主义、孤立主义等理念的领导人当政,那么美日科技合作能否继续进行,合作领域能否继续扩宽、加深,或许都将被打上一个巨大的问号。考虑到目前美国严重的经济不平等和贫富差距依然没有显著改善,白人至上主义和民粹主义的声势依然高企,美国国内政治不确定性对美日科技合作的制约效应将继续存在,短期内难以消解。

第二,美日在部分具体议题上的分歧。大国竞争时代,日本尽管可被视为美国同盟体系中与美国关系最为紧密的盟友之一,但美日同盟也并非铁板一块,在部分议题上美日同盟内部因种种原因同样存在纷争与摩擦。如何管控同盟内部

的分歧由此成为美日同盟的重要课题。就美日科技合作而言，当下在这一问题上“心意相通”的两国也存在一定的分歧。以通信技术领域内的合作为例，日本虽然限制使用华为的产品，却并没有“指名道姓”地针对华为；日本虽然承诺加强与美国在5G业务上的协调与合作，却并没有加入美国所谓的排除中国供应链的“清网行动”。可见，如果不加以妥善解决，相关分歧势必会阻碍美日合作程度的加深，并在一定程度上损耗双方的合作动力与热情。追根溯源，美日双方在部分具体议题上的分歧所折射出的是双方对华战略认知与对华利益诉求的不同。对日本来说，尽管中国需要被制衡，中国的地区影响力需要被遏制，但日本并不想彻底站在中国的对立面，日本依然需要分享中国经济发展的红利。对华战略认知与利益诉求的不同也意味着双方的战略分歧将长期存在，难以彻底调和。

第三，美日两国敏感科技信息管理制度。出于对国家安全的考量，美日两国各自都制

定了相关的敏感科学技术信息管理制度。但是美日两国的敏感信息管理制度均存在一定的缺陷，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对两国的科技合作造成了阻碍，成为两国科技合作深化的重要掣肘因素。例如，有观点指出，日本的法律机制、保护敏感机密信息的制度以及安全文化的缺乏，有时会导致日本不愿意参与一些潜在的合作。2019年，日本经济产业省宣布重新审查日本的学术指导方针，通过制定管理条例限制与外国科学家的合作，以防止日本大学内两用技术的泄露。显然，如果美日两国的科技合作想走得更远，势必会产生大量敏感、机密信息的交流需要。换言之，如果美日两国不调整自身的敏感信息管理制度，使之更符合美日两国进行深入科技交流的需要，那么美日两国间的科技合作很可能将只是“浮于表面”，无法有实质性结果和产生重大影响。

五、结语

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所蕴藏的巨大潜力，以及出于其他战略、战术层面的考虑，美日

决心加强在科技领域的合作。军事科技、通信技术、量子技术、半导体、太空科技是目前美日科技合作的主要展开领域。不过，在人工智能等新兴科技领域，美日也在加强接触，确认合作意向。因此，美日科技合作的领域可能会不断扩宽，值得进一步关注。就美日科技合作特征而言，由于“印太”地区是当前美日同盟的重要地缘关切，所以美日科技合作也以“印太”地区为重要的地缘指向；由于私营部门在两国的科技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所以强调发挥私营部门的作用也是美日科技合作的重要特征；在制度竞争时代，规则制定成为美日科技合作的重要内容。观察未来美日科技合作的走向，美国国内政治、美日在部分具体议题上的分歧以及美日两国各自的敏感信息管理制度可成为主要的着力点，因为这三方面是美日科技合作能否在未来走远、走稳的主要影响因素。

编辑：王星懿

Diana Toimbek: 世界的粮食安全和可持续发展

随着世界人口的持续增长，全球迫切需要更多的努力和创
随新来可持续地提高农业生产力，改善全球价值链的运作，
减少粮食损失和浪费，并确保所有遭受饥饿和营养不良的人都能达到良好的营养水平。

根据粮农组织的定义，当所有人在任何时候都能在物质、
社会和经济上获得足够的、安全的和有营养的食物，满足他们的
饮食和食物偏好，过上积极和健康的生活时，就存在粮食安全。
全。

因此，就粮食安全而言，应分析三种类型的获取方式。

- 实际获取是由一个国家生产（或进口）所需的粮食供应量的能力决定的，其依据是反映需求和生产的粮食平衡表。

- 社会准入是由国家在平等获得食物的基础上为各阶层人口提供食品安全的政策决定的。

- 社会准入还必须包括促进适当的营养——一个社会健康的社会不会暴饮暴食或挨饿。

- 经济上的获得意味着所有阶层的人都能根据自己的经济能力获得足够的食物。

在 2012 年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大会（里约 +20）上，世界各国领导人重申，根据适足食物权和人人免于饥饿的基本权利，人人有权获得安全和有营养的食物。会议启动了联合国秘书长的“零饥饿议程”，呼吁各国政府、民间社会、信仰团体、私营部门和研究机构共同努力，结束饥饿，消除最严

重的营养不良形式。此后，《零饥饿计划》得到了许多成员国和国际组织的广泛支持。它包含了对以下方面的呼吁：

- 完全消除两岁以下儿童的生长迟缓病例。

- 确保全年普遍获得充足的食物。

- 确保所有食品生产系统的可持续性。

- 实现小农场的生产力和收入 100% 的增长。



Diana Toimbek 是哈萨克斯坦阿斯塔纳 IT 大学的社会科学博士，政治学副教授，圣皮耶国际安全中心研究员。她的主要研究领域是非传统安全，著有《非传统安全话语《哈萨克的形成与演变》、《斯坦向知识经济转型的问题和前景》等。

• 实现食物零损失和食物零浪费。

可持续发展目标“零饥饿——消除饥饿、实现粮食安全和改善营养并促进可持续农业”(SDG2) 承认支持可持续农业、赋予小农户权力、促进性别平等、结束农村贫困、健康的生活方式、气候变化和 2015 年后发展议程上的 17 个可持续发展目标所涉及的其他问题之间的联系。

然而，粮农组织的联合国报告《2022 年世界粮食安全和营养状况》明确证实，世界离实现消除一切形式的饥饿、粮食不安全和营养不良的目标越来越远。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 2 的努力正在进行中，但面对日益复杂的挑战和日益增长的不确定性，这些努力正在落空。粮食不安全和营养不良的主要驱动因素（冲突、极端气候和经济冲击）的影响越来越大。营养食品的成本很高，不平等现象日益严重，这些都将继续对粮食保障和营养构成挑战。只有农业食品系统的转型和复原力，以可持续和包容性的方式成为所有人的廉价营养

食品和负担得起的健康食品的来源，才有助于扭转这一趋势。

关于 COVID-19 大流行病将在 2021 年结束和粮食安全开始改善的希望没有实现，因为全球饥饿人数在 2021 年继续上升。由于经济复苏的速度不平衡，以及受大流行病影响最严重的人的收入损失没有得到补偿，国家之间和国家内部的不平等现象不断扩大，推动了这种动态。

自 2015 年以来，营养不良的流行率基本保持不变，但在 2019 年和 2020 年之间从 8.0% 上升到 9.3%，并在 2021 年继续上升，尽管速度放慢，但也达到了 9.8%。2021 年，世界上有 7.02 亿至 8.28 亿饥饿人口。自 COVID-19 大流行开始以来，这一数字增加了约 1.5 亿；在 2019 年和 2020 年间，增加了 1.03 亿，2021 年又增加了 4600 万。据估计，2030 年有 6.7 亿人，即世界人口的 8%，预计将遭受饥饿，与 2015 年通过 2030 年议程时相比没有变化。

2020 年，中度和重度粮

食不安全的发生率急剧上升，2021年几乎没有变化；但重度粮食不安全的发生率却上升了，这是由于那些本来就处于极端不利地位的人的情况恶化了。2021年，23亿人正经历着中度或严重的粮食不安全，全球人口的11.7%有严重的粮食不安全。

截至2020年，22%的五岁以下儿童发育不良，6.7%的儿童营养不良，5.7%的儿童超重。研究发现，生活在农村地区和经济条件较差的家庭、母亲没有接受过正规教育的儿童更容易出现发育不良和营养不良。城市地区和更富裕家庭的儿童超重的风险更高。

2019年，15至49岁的妇女中几乎有三分之一（5.71亿）是贫血，与2012年相比，这一指标没有改善。这种疾病更经常地影响妇女——生活在农村地区的低收入家庭成员，没有受过正规教育。

2020年，近31亿人无法负担健康饮食。这比2019年多了1.12亿。这一增长是由COVID-19大流行病的经济影

响和为遏制它而采取的措施所推动的消费者食品价格上涨所造成的。

最近的负面发展表明，在逐步减少饥饿、粮食不安全和各种表现形式的营养不良方面，政策不再能带来回报。脆弱经济体的政府也面临着重建农粮系统的财政限制。各国政府迫切需要审查它们目前向农业食品部门提供的支持。

2013-2018年，全球对农业食品部门的平均支持几乎为每年6300亿美元。这种支持的最大份额集中在单个农场，通过贸易和市场政策以及预算补贴提供，主要与生产量和自由使用可变生产要素的能力挂钩。所采用的许多支持措施不仅扰乱了市场，而且只针对一小部分农民，损害了环境，没有为生产营养食品创造有利条件。

对农业生产的支持，特别是在高收入和中上收入国家，主要集中在主食、乳制品和其他富含动物蛋白的食品上。在世界范围内，主要是刺激大米、糖和各种肉类的生产；水果和

蔬菜生产得到的支持较少，一些低收入国家甚至正在采取措施使其生产无利可图。

贸易和市场措施会给营养食品的贸易带来障碍，使健康食品在物质上和经济上更难获得。在许多国家，预算补贴提高了基本食品及其衍生品的可负担性，但对无补贴或补贴较少的商品，如水果、蔬菜和豆类的消费和价格造成了障碍。

考虑到各国具体的政治经济和机构能力，以及世界贸易组织(WTO)规则下的承诺和灵活性，以明智的、多利益相关方的、基于证据的方式调整公共支持的方向，将有助于增加消费者对营养食品的供应。这些措施可以降低健康饮食的成本，这是健康营养的一个必要条件，尽管其并不是充分条件。

在采取行动调整政府支持方向以降低健康食品的成本时，政策制定者应避免在农民因资源限制而无法专门从事营养食品生产时可能出现的不平等现象。为了避免增加温室气体(GHG)排放等措施的负面

影响，有必要在高收入国家和中上收入国家根据营养准则引进低排放的营养食品技术，减少排放品的过度生产和过度消费。

在农业对经济发展、就业和生计起着关键作用的低收入国家和一些中低收入国家，政府需要增加并优先考虑以综合方式支持粮食和农业的服务支出。这将缩小有营养和无营养产业之间的生产力差距，并提供收入机会以增加健康食品的供应，就算这需要大量的发展资金。

除了调整国家对农业食品部门的支持方向外，还需要采取其他措施。将需要社会保护和健康政策，以减轻调整支持方向对最弱势群体，特别是妇女和儿童的不可预见的影响。需要环境、卫生、运输和能源领域的政策，以便在生产效率、公平、营养、健康、减缓气候变化和环境保护等领域取得更广泛的成果。

除上述情况外，支持重新定位工作的有效性将受到政治和社会环境、整体领导、权力

(不)平衡以及利益相关者的利益、文化和影响的差异的影响。由于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背景，因此有必要确保在地方、国家和全球层面都有有效的机构，并吸引和激励来自公共和私营部门以及国际组织的利益相关者。

COVID-19 清楚地表明，向民众不间断地提供高质量和安全的食品仍然是首要任务之一，也是在紧急情况下维持稳定的工具。2020年，根据《经济学人》的研究和分析部门，芬兰成为世界上113个国家中粮食安全评级的领导者。该国的综合指数达到了85.3%，这是因为该国提供了高标准的营养、食品安全和供应，生活在全球贫困线以下的人口比例较低，食品价格波动和政治风险较小。

同时，芬兰在计算粮食安全综合价值的4个主要标准之一——粮食供应指数中排名世界第一，为82%，超过了新加坡(75.8%)和爱尔兰(75.7%)。

这一标准主要用于评估研究成本、农业领域的技术和

教育的可用性以及粮食损失。在这些领域，芬兰通过支持环境可持续性来保护自然、资源和生物多样性，努力达到全球标准。例如，芬兰最大的企业Valio计划到2035年成为碳中和乳制品生产商，因为该计划涵盖了从农场到最终消费者的所有产品销售过程。该公司创造了一种草籽混合物，以提高牧场的碳固存能力，努力用沼气取代化石燃料，使用至少由80%的可再生原材料组成的包装，并为农民组织关于农业碳足迹的培训。

为了创建一个可持续的食品系统，芬兰的公司也在追求创新的解决方案，以减少食物浪费。因此，在该组织的“从浪费到美味”项目框架内，建立了一个网络，从制造商和零售杂货店收集剩余的食物，利用这些食物在专门的餐厅里制作各种菜肴。例如，用谷物剩余物酿造的啤酒。

简言之，使饥饿、粮食不安全和所有形式的营养不良难以结束的挑战越来越严重。COVID-19大流行病提高了人们对农业食品系统的脆弱

性和我们社会中的不平等现象的认识，这些现象加剧了饥饿的上升和严重的粮食不安全。尽管全球取得了进展，但儿童营养不良的趋势，特别是儿童发育不良、营养不良、基本微量元素缺乏和肥胖等形式，仍然令人非常担忧。

此外，乌克兰正在进行的战争扰乱了供应链，进一步影响了谷物、化肥和电力的价格。它已经导致了2022年上半年粮食价格的进一步上涨。更加频繁和严重的极端气候扰乱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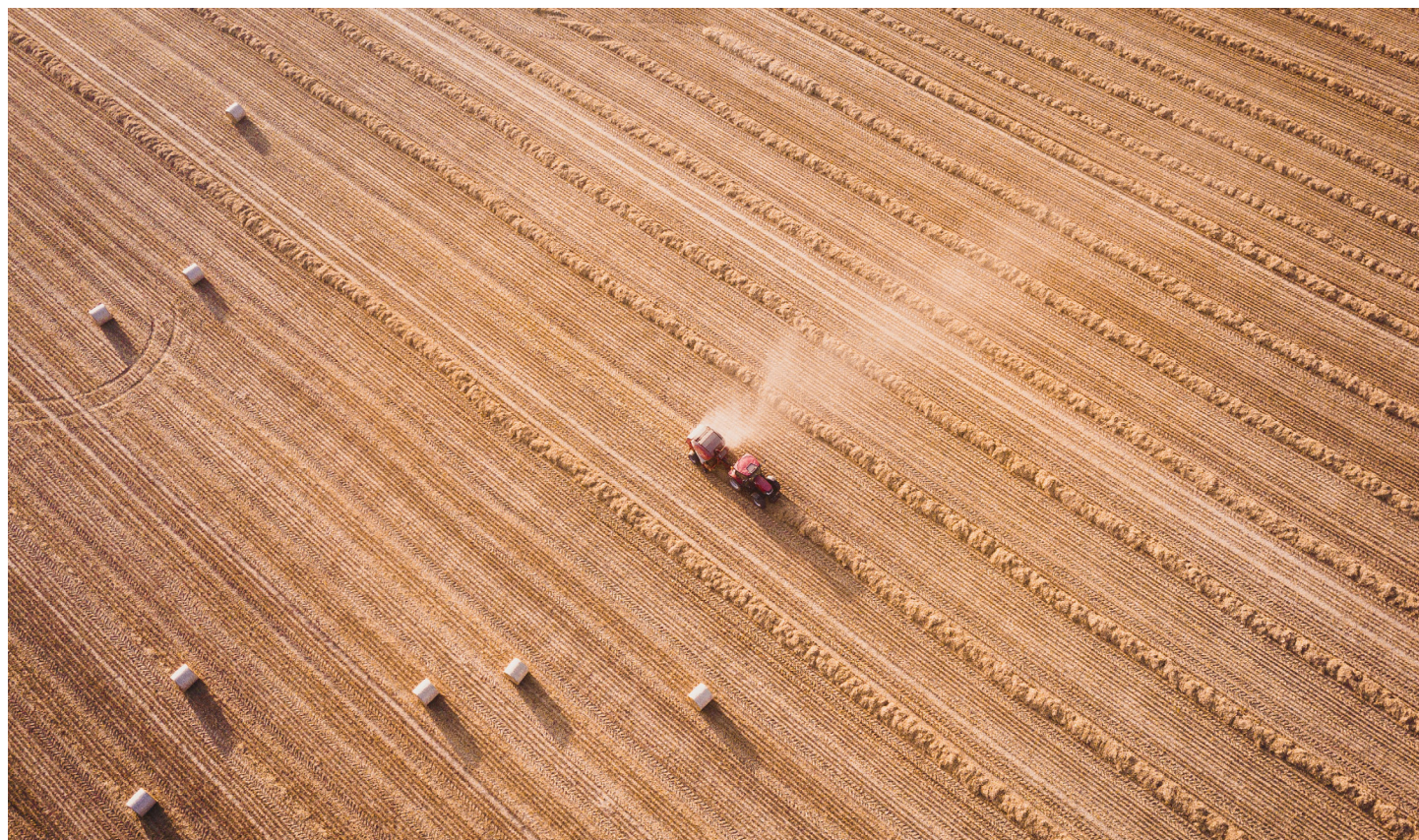
供应链，特别是在低收入国家。

总之，粮食安全是经济安全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它们之间的双重关系是相当明显的。粮食安全在地区发展的经济稳定中占有特殊地位。关于属于经济范畴的其他类型的安全(信息、对外经济、工业等)，粮食安全是基本原则。这个想法可以用一句谚语来最准确地表达：“面包剩下的越少，里面的政治就越多”。

粮食政策应被视为一套措

施，以有效解决农业生产、产品储存和加工、对外贸易、粮食市场监管和农村社会发展的集约化发展挑战。它决定了农工综合体和国民经济某些类型活动的优先次序和“增长点”。企业、地区和整个国家的竞争力都取决于它。如果一个国家没有粮食安全，那么它就不可能在经济上持续发展，也不可能逐步发展的前景。

翻译：许汶



编辑团队



王星懿
执行主编



何香凝
研究助理



李泳诗
研究助理



伍杰辉
研究助理



王钰静
研究助理



许汶
研究助理



杨佳琦
校对编辑

《全球非传统安全观察》

本刊由中国非传统安全论坛秘书处、圣皮耶国际安全中心联合出版，旨在跟踪观察非传统安全议题下的社会资讯、政策动向和学界研究，为从事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工作人员与研究人员提供时新、长久的信息渠道。

本出版物内容版权属于圣皮耶国际安全中心。转载、摘编请注明“来自圣皮耶国际安全中心”。如因作品内容和版权问题需要同圣皮耶国际安全中心联系者，请于 30 日内进行。



中国非传统安全论坛秘书处
圣皮耶国际安全中心

广州市越秀区环市东路 326 号亚洲国际
大酒店 1803 室

联系电话：
020-83870795